

毛泽东高度重视 新中国卫生健康体系建设

□ 罗元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初期，我国烈、急性传染病广泛流行，人口死亡率为25‰，儿童死亡率高达130‰，孕产妇死亡率达万分之150，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面临诸多困难。曾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非常关心，作过许多指示和批示。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关心群众，关心和重视占全国人口近90%的农民的卫生医疗工作。”

除普及农村医疗卫生，推广“赤脚医生”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具体举措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新中国卫生健康体系建设。

全力领导新中国的 卫生防疫工作

1949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对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同年10月，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接种牛痘。1951年4月11日至23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这些方案、条例为此后的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近3000字的工作报告，题为《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提出了“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需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的建议。毛泽东看到报告后作了批示，强调卫生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极力发展这项工作”。这份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批示的第一份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了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这次会议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方针之一，遂确立了新中国卫



1970年代农村赤脚医生出诊

生工作的四大方针。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给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了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即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苍蝇、蚊子。1956年1月，又把除“四害”及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列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具体规定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等“四害”。毛泽东在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指出：“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引导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向讲究卫生、除病灭害的方向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充分显示出聪明才智，创造出不少好的工具和办法。四川郫县群众用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灭蝇，效果很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还前往杭州，检查了该市小营巷的卫生状况。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全国性的灭除“四害”的群众运动，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关于除“四害”、讲卫生问题，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写的信件和作的批示有10余份。此外，为贯彻卫生工作四大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专科防治所、卫生宣传站等卫生机构；在卫生保健制度方面，采取了全国“免费医疗”的做法。

重视中医药，坚持 中西医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卫生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缺医少药，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救助。为改变这种局面，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中中医药的角度特别指出，要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中医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毛泽东认为，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疫疾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表达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的初步思想，并且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提

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并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样一个新方针。1953年12月，第三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落实情况，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的成绩、经验和教训，要求更加努力地培养卫生工作干部。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药大学。这些措施，对于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开展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次提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文化的问题。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对西医学文化学习中医学文化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

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篇《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

1965年，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六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从另一种角度强调了西医学中医从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的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我国卫生健康体系建设，从而使我国卫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健康和生命得到了有效的守护。

（摘自2020年第4期《党史博览》，原标题为《毛泽东与新中国农村卫生健康体系的确立》）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希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
好！

叔仁
五月二十日晚

有便多写信给我。

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托孙仪之同志带的信未交出，一同付你。

此信写于1942年，这封家书是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前几天写给爱妻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市黄茅岭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时他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阅读了《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1924年考入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编入第一队。他在校勤学苦练，受到教官和同学们的称赞。

1924年10月，左权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11月陆军讲武学校一、二队学员转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左权在黄埔军校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6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以后历任新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红五军团第15军政委、军长和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左权经常参与指挥战斗，协助聂荣臻等指挥渡赤水河、过大渡河、夺泸定桥、攻腊子口等战斗和直罗镇战役。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率部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9月15日，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4月，日军以108师团为主力3万余人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博爱、邯郸、长治等地区，左权自率总部警卫团参加战斗，歼敌千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了辽县等18座县城，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日军分三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左权指挥部队警卫团打麻雀战，粉碎了日军的围攻。8月至12月，左权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2万余人，破坏铁路、公路2000余公里，拔除敌军据点3000多处，取得了重大胜利。1941年11月，为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他亲自选择地形，指导修筑工事，并指挥总部警卫团不足千人的兵力，采取“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果”的原则与日军5000余人激战八昼夜，毙敌1200余人。中共中央军委称赞黄崖大捷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1942年初，日军接连向晋东南根据

左权： 别时容易见时难

□ 王家森

地发动“总进攻”。2月，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毒辣手段，不断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区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一带增兵，进行“扫荡”，被我军击破。两个月以后，日军又纠集3万多兵力，进行空前残酷的“五月大扫荡”。24日，八路军总部机关开始转移，左权亲率129师及警卫连部署突围计划，在突围中，由于后勤部门对形势估计不足使几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日军发现了目标从四面合围，步步紧逼。左权命令作战科长及警卫连长护送彭德怀总司令转移至安全地带，自己坚持指挥突围。在总部机关和老百姓转移完毕、掩护部队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八路军卓越的将领左权将军壮烈牺牲，时年37岁。

1942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将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并在涉县石门村西北太行山麓修筑了左权将军陵墓和纪念塔。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将左权灵柩移至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左权将军可谓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谱写了自己辉煌的革命生涯、军事生涯，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军事论文和著作，但很少谈及自己。正因为如此，这些家书便成为抗战时期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家书代表作，这十几封出自左权将军内心深处的文字细腻地勾勒出其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多彩世界。

这批家书除了左权给母亲和叔叔的两封信写于1937年外，其余的信都写于左权与刘志兰1939年新婚后至1942年5月壮烈殉国的戎马倥偬、战事频繁、炮火纷飞的岁月中。

这批家书除了左权给母亲和叔叔的两封信写于1937年外，其余的信都写于左权与刘志兰1939年新婚后至1942年5月壮烈殉国的戎马倥偬、战事频繁、炮火纷飞的岁月中。

1939年2月，中央巡视团到达山西前线，巡视团成员、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刘志兰随团来到山西后留在晋南北方局妇委会工作。经朱德总司令做牵线红娘，左权与刘志兰结婚并于次年即1940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

这批家书写作的时间正值百团大战前后，日军将八路军视为华北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进行了残酷残忍、灭绝人性的“大扫荡”。面对险恶的战争环境——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是天不雨、地久旱、人缺粮、畜缺草，八路军战士缺枪炮弹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家书透露出左权将军对刚刚投身革命的亲密伴侣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对刚出生才几个月就离别的女儿，这个沉黙刚毅的军事指挥员在家书中一变而为慈父，字里行间凝结着对女儿冷暖关爱的骨肉亲情。

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把生命过早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幸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摞鲜活生动的家书，才使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情感细腻的威风男儿。70多年过去了，这些家书的纸张已变成了枯黄色，字迹也淡化了许多，然而，这字里行间蕴含着绵绵深情却永远震撼着我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然而，当一个人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那他的生命就会得到永生。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8月14日）

谢觉哉：正党风要“硬起颈骨来”

□ 刘 颖

1942年4月至11月，谢觉哉以“焕南”为笔名，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辟“一得书”专栏，连续发表60篇文章，配合延安整风。

他在《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提出，写报纸文章就像厨师做菜，总是做大碗肉，容易让读者腻味；应该写一些文情并茂、有针对姓、以理服人的小文章，既避免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脸孔说话的疲劳，又能改进文风、创作出更多的精致作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

宣传实事求是精神，“一得书”还用充沛的感情和老练的笔调痛斥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正党风。

在文章《把颈骨硬起来》中，谢觉哉讲述了汉朝京兆尹面对皇权刚正不阿的故事：京兆尹有一天在街上把皇帝姐姐的辮头打了一顿，公主向皇帝哭诉。京兆尹坚持自己没错，在皇帝要他磕头道歉时硬起颈骨，几个人压都压不埋。他用这个故事强调敢于维护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并以此回应早前在《解放日报》上看到的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党、政、军、学人员藐视市府

法令”、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政府职权的要求；认为应该“提高市府职权”，但也强调“道府从没有允许党、政、军、学人员可以藐视市府法令的规定”。他提倡有法必依，“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硬起颈骨来。”文章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深入浅出，既提倡维护法制，又提倡敢于维护真理的精神，传播了延安作风。

再如《忆叔衡同志》怀念何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笃实刚介的精神，《怎样做县长》提倡做有学识、亲民、“知稼穡之艰难”

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县长，《“就文件讨论文件”》要求原本本学习文件精神并用于指导实践，等等。这些文章列举同志间不团结、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基本理论的危害，指出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同群众相结合，做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文章有感而发，娓娓道来，意味深长。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4月3日）



多年的入党誓词交给组织。

细细观摩这份入党誓词，那一笔一画虽然粗糙，却饱含沉甸甸的赤诚之心；红布已然褪了颜色，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不褪色。我们党的入党誓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不同特色，但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贯穿始终。我们党创造的辉煌历史，正是在无数共产党人的声声誓言和一步一个脚印的践行中实现的。

（摘自《中直党建》2018年第2期，原题《平凡党员的不平凡誓词》）

现存最早的 入党誓词

□ 孙迪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是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我们党目前现存的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员贺页朵入党时的誓词。这份入党誓词用毛笔写在一块红布上，只有6句话：“牺牲个人，言（严）首（守）秘密（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誓词主人贺页朵是出生于江西永新县的农民，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25日，在榨油坊里

微弱的桐油灯下，贺页朵举起右手，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他认认真真将入党誓词写在红布上，更写入了他的心坎间。虽然24个字中有5个别字，但他对每一个字都有真切领悟，并伴随他漫漫人生。1934年，在一次伏击战中贺页朵不幸负伤，无法跟红军长征，只能留下来坚持斗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的心始终与党紧紧相连。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入党誓词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永志不忘。1951年，中央赴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来到永新，贺页朵亲手将这份珍藏